

泰中学刊

诗琳通



泰中學刊

詩琳通

泰國泰中學會出版

公元二〇〇一年

泰 中 學 會

第 七 屆 理 事 會

顧 問：強・提拉逸博士

沙拉信・威臘蓬博士

會務顧問：江白潮

會 長：張仲木

副 會 長：林光輝 黎道綱 林長茂

秘 書：洪 林

財 政：修 朝

理 事：謝遠章 何紀文 徐仲熙

出 版：泰 中 學 會

主 編：洪 林 黎道綱

封面設計：洪 林

發 行：泰 中 學 會

印 刷：健 心 出 版 社

規 格：16 開 本 300 x 210 MM

印 數：1 - 800 冊

書 號：ISBN 1685-1978

出版日期：2001 年 11 月

售 價：200 銖

目 錄

✓ 1 · 華人移民泰國及其對社會的貢獻 (黎道綱)	1
✓ 2 · 中國加入世貿與泰國經貿關係 (張仲木)	15
✓ 3 · 泰國潮人道教信仰考察 (林悟殊)	29
✓ 4 · 世紀之交中泰關係的新發展 (朱振明)	38
✓ 5 · 泰華潮州文化概論 (洪 林)	49
✓ 5 · 吞武里王朝時代的泰中經濟貿易關係 (張仲木) ...	62
6 · 昆侖古龍辨 (黎道綱)	66
✓ 7 · 融入泰國社會的潮州人 (夢 祖)	73
✓ 8 · 1938—39 年的泰華戲劇 (關瑞發)	82
✓ 9 · 中國藥品在泰供銷憶述 (恩 裕)	99
10 · 千秋明燭紀豐功 (陳健民)	105
✓ 10 · 論泰華客家人的歷史 (涂仲熙)	115
12 · 泰國新年元旦的沿革 (修 朝)	126
✓ 13 · 泰華女性作者群素描 (洪 林)	128
14 · 泰國傀儡戲滄桑史 (修 朝)	134
15 · “生陳死林”的由來 (盧永光)	136
✓ 16 · 悠悠九年話《泰中》 (洪 林)	138
17 · 編後話	142
18 · 附錄	143

華人移民泰國及其對社會的貢獻

黎道綱

華夏民族移民到今日泰國土地上來，歷史十分久遠。根據考古發現，這個過程早在新石器時代和青銅時代已在進行。在泰國發現長方石斧和仰韶圖案陶器，都可以說明這一點。3,800年前的班清文化，2,400年前素可泰班汪哈古代遺址和其它地區發現具有滇文化色彩的金屬文化，中部和南部為數眾多的銅鼓，都標誌著中華古國和泰境的交往。只是這一切都沒有文字記載。

中國與泰境交通的最早記載是《漢書·地理志》，其中提到自中國到印度、詩里蘭卡的行程，途中經過都元國、邑盧沒國和諶離國，這些古國分別在今泰國巴真府室摩訶梭古城、素攀府烏通古城和北碧府，即後來的沱洹、金鄰和頓遜等國。[1] 在孫吳和晉南北朝期間，還有赤土、盤盤、墮羅鉢底和狼牙修國等等，但是仍舊沒有華人僑居的文字記錄。

最早的記載出現在唐代義淨《大唐求法高僧傳》，云：

大乘燈禪師者，愛州人也，梵名莫訶夜那鉢地已波(MAHA YANA-PRADIPA 原註：唐云大乘燈也)，幼隨父母汎舶往杜和羅鉢底國，方始出家。後隨唐使剡緒相逐入京，於慈恩寺三藏法師玄奘處進受具戒。居京數載，頗覽經書，而思禮聖蹤，情契西極。遂越南溟，到師子國，觀禮佛牙，備盡靈異……。

杜和羅鉢底即墮羅鉢底，其遺址在今佛統古城。愛州在今越南，唐時是中國領土。由此可見，早在唐代，已有中國子民到今泰境佛統一帶往來貿易，進而有華夏子弟在這裏出家。只是，大乘燈禪師的父母乃“汎泊”，並未言及流寓，所以還是不能貿然下結論說，華人已有規模地僑居泰國了。此外，沒有再見到唐代華人入泰的記錄。

中國自漢朝至唐朝（約自公元前二世紀至九世紀），私人貿易情況記載甚少，但朝廷與地方派遣使團前往海外，鼓勵外商定期前來中國港口的記載卻很多。到了唐代，外商在廣州已多到可形成社區。不過，由于尚未完全掌握季候風規律，導航看日月星辰而行，陰雨逐風而去，航運很不安全，只能近海航行，貿易規模有限。同時，出于儒家傳統思想，商人雖然能積累財富，但其社會地位卑微，也限制了貿易的向外擴展。

一 早期移民是江浙人

宋代（980—1276）財政拮据。十二世紀初遷都杭州後的南宋，爲了增加國庫收入，大力發展海外交通，繁榮對外貿易。除了沿續唐代于廣州設市舶司外，還先後在明州、泉州、杭州（澉浦）、溫州、秀州（華亭縣，今上海松江縣）、江陰、密州設市舶司，主持對外貿易。明州即今江蘇省寧波，其港口定海港是當日四個最繁榮的港口之一。此時期，寧波的航運和造船業達到全盛時期。據《宋會要輯稿》載：哲宗元祐五年（1090）正月四日，詔明州、溫州“歲造船以六百隻爲額。”（“食貨”五十）特別是高宗建炎三年（1129）在明州得千舟。足見當時明州的造船規模。

就在這個時期，出現了中泰交通的記載。

樓鑰的《攻媿集》記載，宋乾道元年（1165），有真里富國大商死于明州。慶元六年（1200），真里富國遣使上表，1202年、1205年又來貢。真里富國在今泰境叻武里府直轄縣。

宋光宗嗣位（1190年）後，禁止外國商舶進至澉浦，杭州舶務隨之裁撤。寧宗慶元元年（1195），明州升爲慶元府後，更禁止外國商船停泊在江陰、溫州和秀州。至此，凡出入商船，唯由慶元府（明州）處理。

這種現象一直到元代並沒有改變。元世祖至元十一年（1274）、十八年（1281）出兵征日本，遇颶風，舟回，回慶元。《元史·爪哇傳》：“至元十九年（1292）九月，征爪哇，會軍慶元，登舟浮海。”《元史·食貨志》：“至元十四年（1277），立市舶司于慶元、上海、澉浦，……”“成宗大德二年（1298），并澉浦、上海入慶元市舶提舉司。”都是有說服力的記載。

1165年已有今泰境商人前來寧波貿易。由此可以推測，至遲在1165年，亦有中國商人到今泰境來，或貿易、或流寓，成爲最早的華僑。由于上述口岸，除廣州、泉州和密州以外，其餘都在江浙一帶，因此，當日往來南洋的華人，主要是江浙人。

可以作爲旁證的是，元成宗時，浙江溫州人周達觀隨使到今柬埔寨，他于1296年農曆2月從明州啓程，2月20日（公曆3月24日）自溫州開洋至其國，滯居年餘，于次年8月30日返抵寧波。他寫了著名的《真臘風土記》，書中‘貿易’一節載：“國人交易，皆婦女能之，所以唐人到彼，必先納一婦人者，兼亦利其能買賣故也。”‘流寓’一節載：“唐人之爲水手者，利其國中不著衣裳，且米糧易求，婦女易得，屋室易辦，器用易足，買賣易爲，往往皆逃逸於彼。”

‘異事’一節載：“余鄉人薛氏，居番三十五年矣，……。”則周達觀的浙江同鄉在宋朝末年景定年間（1261—1262）已流寓到柬埔寨。在‘死亡’一節，記

載真臘人死時作天葬後提到：“今亦漸有焚者，往往皆唐人之遺種也。”說明華人入真臘已數代人。這些到南洋貿易或流寓的華人，往往與當地婦女通婚。這種風氣在江浙人到泰境暹國、真里富貿易、流寓時，諒亦如此。

此外，宋史載，南宋滅亡時，浙江永嘉人陳宜中是朝廷左丞相。南澳之敗後，“欲奉王走占城，乃先如占城諭意，度事不可為，遂不反。至元十九年(1282)。大軍伐占城，宜中走暹，後歿於暹。”

陳宜中走暹並不是倉惶出奔。他到占城後，結識了江浙商人，他們早在1165年以前已沿著明州（今寧波）—真里富的路線貿易往來，而占城正好在這條貿易線上。由于真里富與宋廷貿易來往頻繁，不便匿身。他向江浙同鄉了解到占城人稱為‘潯番’的中國人頗為陌生的國家。因此，到了1282年，當元軍伐占城時，陳宜中遂帶領了一大批隨從眷屬，流寓潯番，即暹國，後來死在暹國。這個暹國在今素攀。類似因宋亡而流寓今泰境的江浙人，為數應不少，其中有的人在流寓國度裏有了官職。

元代《皇元風雅》卷22載《暹國回使歌》，其前小序說，暹國在“天祿(1328—1329)初，嘗遣使入貢。今天子嗣位，繼進金字表章，……使者錢唐人”。

1995年12月，饒宗頤在曼谷演說，[2]提到《暹國回使歌》詩中有“先皇在位歷五載”之句，說先皇指泰定帝。泰定帝在位五年(1324—1328)，故詩序的天祿初指1328年。

陳高華說，在“天祿初，嘗遣使入貢”後接著說，“今天子嗣位，繼進金字表章……”似乎表明，天祿初年入貢是一回事，作《暹國回使歌》這次入貢又是一回事。此先皇指元文宗。故此詩應作于元惠宗(元順帝)元統元年(1333)，而不是天祿初年(1328)。[3]

詩序提到，1333年來華的暹國使者是錢唐人(今杭州)。饒宗頤說：“暹國用為官，自來有之。使臣既為浙江人，令人推想，浙江人應有不少南來營商。”這個推斷很是合理。

二 大城時期的福建人

宋政和五年(1115)，福建泉州興復市舶。七十年後的《諸蕃志》記載了許多今泰境泰海灣周圍國家的名字，如登流眉(碧武里)、羅斛(華富里)、潯番(素攀)、真里富(叻武里)、波斯蘭(春武里)、窳里(猶地亞、大城)，說明泉州對泰境古國已甚熟悉。宋末元初，泉州的海外貿易進入鼎盛時期。元末，泉州發生“亦思巴溪”叛亂，泉州港繁華不再。到了明代，中國沿海受到倭寇的騷擾，明廷對海外貿易嚴格限制，規定泉州只能通琉球一地。公元1472

年，泉州市舶司遷往福州，泉州港從此淪為內港。

與此同時，因寧波附近的海島曾是倭寇出沒的據點，1369年，明太祖禁止通蕃下海，公元1371年12月至1394年1月間連續四次下達“片板不許入海”的禁令，寧波港因此大受打擊。但明初海禁只禁本國船只出海，並不禁止外國船只進港。到了嘉靖二年（1523），寧波慘遭洗劫，才下令停止市舶，撤銷寧波市舶司，完全閉港。

明初的海禁和對流寓海外華人的‘引渡’，嚴重限制了華人移居海外的趨勢。鄭和下西洋主要目的又在于宣揚國威，打通航路，招引外蕃，並沒有造就華僑的大量增加。

宣德皇帝（1426—1435）死後，皇室發生糾紛，影響到瓷器生產。正統（1436—1449）、景泰（1450—1456）、天順（1457—1464）三朝，瓷器生產（特別是官窯瓷器的生產）出現低潮。據《明英宗實錄》記載，正統三年（1438年）十二月丙寅，“命都察院出榜，禁江西瓷器窯場燒造官樣青花白地瓷器于各處登賣，及餽送官員之家。違者正犯處死，全家謫戍口外”。正統十二年（1447年）十二月甲戌，“禁江西饒州府私造黃、紫、綠、青、藍白地青花等瓷器”。因此，這段時期的官窯青花瓷器極為少見。

張燮曾經總結道：“成、弘之際，豪門巨室間有乘巨艦貿易海外者。”（《東西洋考》餉稅考）在成化（1465—1487）、弘治（1488—1505）年間尚且間而有之，那麼，在鄭和最後一次下西洋的宣德至正統、景泰、天順這三十年間，更不可能有大量出國的現象。

泰國考古學者在大城環城河道中打撈到中國瓷器，自1952年至1976年，共得瓷器不下千噸，其中幾乎沒有發現明朝初年至中葉的瓷器。[4] 不失為有力的旁証。

清道光年間福建官員徐繼畲說：“明初，遣太監鄭和等航海招（諸蕃）致之，來者益眾。迨中葉以後，歐羅巴諸國東來，據各島口岸，建立埔頭，流通百貨，于是諸島之物產，充溢中華。而閩廣之民，造舟涉海，趨之如鶩，或竟有買田娶婦，留而不歸者。”[5] 這條記載說明，在鄭和下西洋後百餘年的明代中葉，歐洲殖民者東來，中外貿易發展很快，才造成華人流寓南洋者迅速增加。

在暹羅，當發掘大城王朝昭三披耶王登位初期（1424）建造的拉差武拉納寺時，發現塔內窖藏華人金器獻物，上有華文“大明國”字樣，說明當日定居大城的華人相當富裕，與王室關係密切，入暹定居至少已五十年。十六世紀前期，大城有“奶街，華人流寓者之居”；在大泥（北大年），“華人流寓甚多，踵相接也”。這些華人大部份是福建人。例如，福建莆田縣城關《林氏族譜》記載，族人于明永樂年間到暹羅經商。汀州人謝文彬，昔年因販鹽下海，為大風漂入暹羅，改名美亞，遂仕其國，官至岳坤，于明成化十三年（1477）充暹羅使入貢。萬曆間，大泥國王病卒，無子，立其女為王，漳州人張某為哪督，“哪督者大酋

之號也”。

有明顯的證據證明，在大城王朝時代，華人居住區就已經廣泛分布在大城城牆內外，比較集中的地區是在磅碧炮台和拍南乘佛寺一帶。此外，華人還在東部沿海的萬佛歲、尖竹汶和南方的宋卡、北大年建立居民區。估計在佛曆二十三世紀（公元十七世紀中葉）時，居住在泰國的華人已達一萬人，其中居住在大城的有三千至四千人。他們大多為商人，也有從政當官的，從政者大部分是在華民政務司任職，也有為泰政府從事帆船貿易的；其他有當工匠、醫生、演員的；也有從事農業，如種植果樹、蔬菜、養豬等等。[6]

三 清初的大米貿易

清初，鄭成功據台灣，很多海外明末遺臣對鄭氏政權有力的支持，給清廷造成很大困擾，清廷亦一度實行“海禁”、康熙十九年（1680），清廷收復廈門。二十三年（1684），清廷詔開海禁，並在廈門設海關，廈門港得到空前發展和繁榮。但是，康熙五十六年（1717）又行海禁，所幸時間不長，雍正五年（1727）就解禁了，第二年再定廈門港為福建對外貿易唯一窗口。當時沿海各省出洋貿易商人，以“閩省最多，廣省次之”。

中國東南沿海地區地狹人稠，產米不敷食用，加上奸商屯積居奇，不少地方出現了搶米風潮。為了緩和這種緊張局面，清政府允許進口暹羅大米。

康熙六十一年（1722），康熙皇帝表示：“暹羅國人言其地米甚饒裕，價值亦賤，二三錢銀即可買稻米一石。朕諭以爾等米既甚多，可將米三十萬石分運至福建、廣東、寧波等處販賣。……不必收稅”。[7] 清政府的要求得到大城王朝的響應。

為了鼓勵暹羅的大米進口，清政府還在銷售價格方面採取優惠措施。當時，把暹羅米運到中國的實際經營者是居住暹羅的華人，這件事促使清政府改變態度，允許華人在暹羅商船上充當水手。由於運米商船一般都附載其他貨物，乾隆年間，已有不少華商利用暹羅的廉價優質木材造船，運米回國。

因此，十八世紀中葉的大米國際貿易，使中國與暹羅的交通得到大發展，這個時期扮演主要角色的是福建人。到了乾隆二十二年（1757），廈門港商船輻輳，百貨匯聚，盛況空前。

據統計，到了明末清初，中國開往東南亞等地的商船每年平均約 91 艘左右。明代最高為萬曆二十五年（1597）137 艘，到清代 1820 年則增至 295 艘。商船貿易的來往，也導致華人流寓海外。

十七世紀九十年代初期，中國人在暹羅人數達萬人之數。像這樣可觀的數

字，使人可以了解當時的對外貿易幾乎全掌握在中國人手中，因為事實上當時全暹羅的人口，不會超過二百萬人。1720年一位訪問大城的英國人說，那里的中國人‘非常之多’。中國人“是指中國東南的福建、廣東、江西等省的商人，而其中最多的是閩東南商人，他們在中暹貿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中國東南各地商人中，閩商與暹羅貿易發展最好，這部份原因是由於閩商善於運用與暹羅宮廷維持著的長久的親密關係，熟悉地方情況。而廈門港是閩東南商人從事中暹貿易的重要港口。”[8]

泰沙王（1709—1733）時，任命一華人為財庫昭披耶。

1750年到暹羅謀生的海澄人吳讓，在吞武里王朝、曼谷王朝時，被封為宋卡侯王，此職務由吳氏家族世襲，歷傳八代，凡150年。

曼谷王朝第一世皇時代，華裔拍耶拍康（鳳）（據云名洪孔）任財政大臣，有文采，翻譯中國著名古典小說《三國演義》為泰文，至今尚為學校教材。公元1805年去世。後裔無任官職者。

拉瑪二世時，被人稱為座山鍋爐的福建人林氏，被封拍英他拉阿功，專門管理華人事務的官職，為今皆律姓氏的始祖。其女入宮為王妃，傳後裔為巴莫姓氏，先後出了社尼·巴莫和克立·巴莫兩個總理，後者是與中泰締交的主角。

初滴甲沙天姓氏始祖陳天，生于公元1826年，其父陳芝于拉瑪一世時來泰。1879年，陳天被封為華民政務司長披耶初律叻差色提，為華人領袖。他倡議興建大城挽巴茵皇宮天明殿，籌建詩里叻醫院，對1871年建的龍蓮禪寺進行維修，他和其夫人的部分骨灰藏于該寺中殿。這個家族從第二代起都進入政界，究其原因，此家族興起的時代，是政界在泰國社會具有極大權威和作用的年代。[9]

此外，還有1842年出生于潮安縣的張君丁（張宗煌）的梳拍諾隆家族[10]，1839年出生于澄海縣的“鄭蟹”的鄭察甘蒲家族都是曼谷王朝初期影響頗大的華人家族。[11]

龍溪人許泗章，25歲出國謀生，先到檳城。1844年向暹羅王拉瑪三世謀得泰南拉廊一帶的採錫權，這一帶從此繁榮。1854年因開發有功績受封為拉廊王（城主）。在1932年政變前，子裔一直在政府擔任重要官職。

曼谷最古老的本頭公廟，傳說是座落于今日大羅斗圈一帶的火車站後面。該廟原是福建人合力興建的，稱為暨南廟。根據廟中柱上所刻文字記載，該廟原本始建于1786年，後在1956年重建。該廟廟址從未搬遷，座落在“挽柿介”溪（雞腸溪）邊。[12]而潮籍人遲至1816年才建其最早的廟宇萬望古廟。

曼谷四座福建人廟宇，全都座落在有圍牆的範圍內，建築裝飾及陳設華貴，說明其背後有強大而富有的社團支持。再者，它們都是曼谷最古老的華人廟宇，分別于1781、1804、1824、1848年就已存在。具有意義的是，福建人廟宇沒有在1850年之後建的。如今泰國許多地方雖然是潮州人佔優勢，但在1850年以前，福建人扮演的角色至關重要。[13]

廈門大學南洋研究所林金枝作過長期研究，得出結論說，鄭和下西洋以後相當長的時期內，並沒有出現華人大規模移居南洋的歷史現象。只是到了明朝後期，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海禁的鬆弛、歐洲殖民者東來，才造成東南沿海人民大規模出國。福建人民大量出國是在鴉片戰爭以後。[14]

到了 1857 年以後，中國對暹羅貿易中心已由廈門轉向潮州，造成福建人來暹人數日少，而潮州人來暹卻與日俱增，很快就後來居上了。

四 百餘年來的潮州移民

明代中後期潮州地區活躍的海上走私貿易，開啓了潮州人向東南亞移民的先聲。嘉靖、萬曆年間潮州海寇商人集團林道乾敗走暹羅，成為早期潮籍移民。

1684 年詔開海禁，自此，“粵東之海，東起潮州，西盡廉南，南盡瓊崖，凡分三路，在在均有出海門戶，自海禁既開，帆檣鱗集，瞻星戴斗”（梁廷枏《粵海關誌》）。[15]

雍正元年（1723），規定廣東船用紅油漆飾，故廣東船稱紅頭船，這些紅頭船以澄海樟林港為停泊地。隨著大米貿易的發展，許多潮州人因此移居暹羅。1767—1782 這 15 年間，澄海人後裔鄭信在暹羅為王，潮人被稱為津鑾（皇家華人），也促成潮人湧入暹羅。

曼谷王朝第三世皇和第四世皇時期，華人大批寓居泰國。那時，中國自然災害頻繁和戰亂不已，潮汕一帶人民生活困苦，而泰國社會由於振興經濟和開展社會改革需要大量的勞動力，在當年的社會和經濟條件下，中國移民能夠給泰國提供最為需要的，富有商業經驗和工藝技術的勞動力，加上王室對華人政策友善，華人于是大量前來。

據估計，曼谷王朝拉瑪三世（1825 年）初期，中國移民每年大約有 6000 至 8000 人，旅泰華人約 283,000 人，當時全國人口 4,750,000 人；拉瑪四世中期（1860 年），華人約 337,000 人，全國人口是 5,450,000 人。

1857 年以後，中國對暹羅貿易中心由廈門轉向潮州。1860 年汕頭開埠後，人口壓力、地方動盪等因素，造成潮汕人出洋高潮。拉瑪五世（1868—1910）中期，華人增至 497,000 人，當時全國人口是 6,670,000 人，拉瑪五世後期，華人已達 792,000 人，當時全國人口為 8,304,000 人。

造成潮汕人出洋高潮，其因素大致如下：[16]

1. 國內生活的困苦和海外對勞工的迫切需要。
2. 1927 年中國大革命失敗，被迫害者出洋避難者甚多。
3. 1937 年蘆溝橋事變後，為避戰亂，人民紛紛外逃。

4· 抗日戰爭勝利後，發生嚴重糧荒，金融崩潰。

關於百年來中國移民人泰的數字，斯金納的統計數如下：

1882—1892 年， 入境多于出境人數 78,100 人

1893—1905 年， 入境多于出境人數 193,200 人

1906—1917 年， 入境多于出境人數 180,200 人

1918—1931 年， 入境多于出境人數 499,700 人

1932—1944 年， 入境多于出境人數 91,200 人

據斯金納估計，在紅頭船時期（1882—1944），移民到暹羅的潮州人達一百萬人。

江白潮對戰後三年（1945—1949）的統計是：入境人數多于出境人數 167,370 人。因此，自 1882 年至 1949 年移民到暹羅的人數是：1,209,770 人，[17] 其中多數是潮汕人。

到二十世紀初，由于江浙移民的後裔早已融入當地民族，後期福建移民大部分只存後裔，亦逐漸融入當地社會，只有潮州人還是第一代或第二代移民，他們講家鄉話，保持濃郁的家鄉風俗，而且數目十分龐大，他們自成社區，貿易往來，婚姻嫁娶。二次大戰前在曼谷市區，不曉泰語，只用潮語，可以生活如常。

如今，紅頭船時期的移民都已謝世了，戰後來的十餘萬新唐也垂垂老矣。這些華人在泰國落地生根，其後裔逐漸融合于當地主體民族，成為泰族組成的一份子。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這些華裔在泰國的政治領域、經濟領域和社會文化領域扮演重要的角色，為泰國以至東南亞地區的繁榮進步作出重大的貢獻。

五 華人的融入當地社會

曼谷王朝時期，泰國封建社會通過封建領主而對依附民（庶民）實行嚴密的控制，不論泰人、孟族、高棉人，還是越南人及其他民族，一概如此，但唯有華人例外。政府把他們列為外國人，不受封建領主制的約束。政府給華人這一名詞的定義是：留著長辮子的中國人及其後裔。華人後裔如果還留著辮子，就被認為是華人。但是，如果他們已辦理紋腕登記手續，即使仍留有長辮子，則被認定是泰國人而置于封建領主制管理之下。[18]

政體改革前的泰國政府之所以沒有對華人實行封建領主制，是因為政府在各項經濟活動中需要依靠華人勞動力及其專長，以使封建社會在曼谷時代發生的經濟和社會變革中得以維持下來，因此政府有必要給予華人以封建領主制以外的自由，而尋求其他恰當的方式來管理華人。在曼谷王朝初期，這種管理主要是通

過華民政務司以“火漆小牌”（指對華人收繳居留稅。當局在完稅者手腕上縛火漆小牌，以示其合法居留身份）的方式來實行的。

由於華人移民享有特權，可以在泰全境旅行而不必服役，而且賦稅比泰人少，因此激勵他們從事貿易的積極性，以便把其所賺取的金錢匯往中國，資助其家庭。華人對於發展泰國國內貿易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華人的經濟活動本身促使他們散居泰國各地，國內貿易的日趨發展也促使華人定居泰國中部和南部幾乎所有城鎮，從事貿易活動。作為商品生產的工業和農業也同樣吸引了大批華人遷入工業區城鎮及商品化種植業地區定居。

那麼，華人和泰人的關係是怎樣的呢？他們又是如何融入主流社會的呢？

泰國學者匿提・姚西翁對華人的融入泰國主流社會，作了這樣的描述：其方式大致上可以分為兩類：

第一類華人，他們在經濟及社會上獲得了成就，就是說，他們有了良好的經濟地位，並能對封建制度予以滲透。例如，出任官職並享有爵位，或通過與封建貴族家庭子女的婚姻而建立姻親關係。這部分華人同泰國封建貴族有親密關係，有機會同泰國的上層文化進行密切的接觸。因此，他們可隨時同化到泰國上層社會，而同化的速度越快就越能夠為自己在經濟上及社會地位造益，並隨時可以剪去辮子去遵循泰國上層社會的傳統習俗。

上面所描述的華人，就是曼谷市的華人，是那些成功地滲透到泰國封建制度的上層社會的華人。

另一類華人，他們要比一般的泰國人在經濟上獲得成就，他們是在泰國業已進入貨幣經濟時代而旅居泰國的。正當泰國人處於自給自足經濟與市場商品經濟交替之間的時候，這些華人卻已紛紛進入城鎮從事礦業、種植甘蔗、胡椒、制糖，或成為造船技工等。

他們極少有機會接觸到泰國上層文化。雖然他們都生活在泰國居民社區中，甚至同泰國姑娘結了婚，但實際上，他們同泰國人的交往僅限於一定範圍，即買賣上的關係。因此他們不可能充分地向泰國社會滲透，因為無論在經濟上或社會上都不可能為他們創造任何利潤。這部分華人被同化的進程相當緩慢。比如，他們不會輕易地剪去其辮子（辮子維系華人特徵在泰國維持了較長的時間），至少在第一代、第二、三代人是不會剪去辮子的，而且對他們自己來說，保持中國人的特徵總要比成為泰化居民有益得多。例如，能夠保留君王所賦予華人的某種特權，諸如繳納人頭稅就比泰人稅民所繳納的勞役稅要低廉得多。

總而言之，要放棄其中華民族意識，這些華人移民要從以下兩條路作選擇，如果被化到泰國封建社會裏去，就寧可化進上層社會，否則，仍舊維護其中華民族的本色。這樣做，可取得多方面好處，這還未包括能夠和自己的同胞保持祖籍民族觀念而贏得心理上的好感，以及前途方面的許多收益。[19]

六 華人對泰國社會的貢獻

由於早期華人出國並沒有攜帶家眷同行，[20] 他們移居泰國後，與當地泰人婦女通婚，其後裔迅速融入泰國社會，有的擔任官職，有的成為巨商，任職各級公務員者，比比皆是。

拉瑪七世王陛下于 1927 年 3 月駕幸華人學校視察時發表聖諭稱：“實際上，泰人和華人可謂真正的兄弟民族。此外，泰人血統與華人血統也已合而為一，密不可分。過去和現在正在任職的華裔血統高級官員為數眾多，在泰國安家落戶以致變成泰人的華裔也為數眾多，就連朕本人也擁有華人血統。因此，泰人和華人相互交融、親密相處已有悠久的歷史。朕的最大願望莫過於希望泰華之間的關係一如既往、親密無間，並永久維持下去。朕希望諸位與朕一樣，有此同感，並認真教導後代，使他們也產生這種意識。在諸位的學校裏，諸位必定會教導學生熱愛中國，因為中國是他們的祖國，此乃人之常情，理所當然。但除了教導他們熱愛中國以外，朕還希望諸位同時教導他們熱愛泰國，因為諸位已來到暹羅國定居，並得到了暹羅政府的庇護，可以安居樂業，享有與泰人完全同等的權益，在暹羅國過著幸福、愉快、富裕和美滿的生活……。” [21]

由於華人移民人數與日俱增，又較早進入商品經濟，對泰國經濟有著相當影響。泰國實業興起後，商品經濟發展迅速，經濟驟起巨大變化。到了近代，泰國華人更發揮其專長，在政治、經濟、文化各個領域，取得長足的成就，對泰國的繁榮和進步作出巨大貢獻。

華人在政壇上顯示其才華，傑出的人物數不勝數。[22] 其中擔當總理職者，計有乃比里·帕儂榮（一說陳嘉祥，一說陳璋茂）、他旺·納哇沙越（鑾探隆，鄭連淡）、乃樸·沙拉信（黃氏後裔，父名黃天異）、他寧·皆威遷（華裔）、察猜·春哈旺、阿南·班雅拉春、乃川·呂派（呂基文）、挽限·信拉巴阿差（馬德祥）以及現屆總理塔信·秦那瓦。

比里·帕儂榮，祖籍廣東澄海縣上華鎮下陳村。其曾祖父陳盛于 1814 年來泰，歷居大城。比里參與推翻君主專制為君主立憲的政變，創立法政大學，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是抗日的“自由泰”領導人。1983 年 5 月 2 日在巴黎去世，時 83 歲。

中泰建交時任泰國外長，建交後任泰中友好協會會長的察猜·春哈旺說，他的祖父是潮籍人，名開，是個走江湖醫生。現仍保存著他留下的許多走江湖治病救人的秘方。又說，他的外祖父林昌是來自汕頭的華人。

阿南·班耶拉春的父親是孟族血統，而其母親卻是初滴甲沙天（陳）姓氏。中泰建交時，他是外交部次長。為中泰建交做了許多準備工作。

現屆政府總理塔信·秦那瓦是第四代華裔，客家人。其曾祖父丘盛于 1887 年來泰，在尖竹汶立足，後到清邁定居。任稅務官。

擔任過政府重要職位而著稱者有：沙願·杜拉叻、培·黃帕功、頌邁·雲達軍、巴實·干乍納越、巴曼·阿里綠訕、披猜·叻達軍（陳裕才）、米猜·盧趨攀等。

沙願·杜拉叻（張良心）是乃比里自由泰重要成員，後任泰國駐中國南京政府首任大使，對促進中泰關係有貢獻。

培·黃帕功（黃培謙），祖籍廣東饒平，前國家銀行行長。1916 年生于曼谷。二戰時，參加自由泰。後任法政大學校長。是一位為國獻身，受泰國各界推崇的模楷。

頌邁·雲達軍，其父雲竹亭，原籍海南文昌縣雲氏。其叔雲天良曾任過兩屆外長，財政部長，以及樞密院大臣。頌邁·雲達軍（雲蓬松）任財政部長，

巴實·干乍納越（許敦茂）早年到上海暨南大學讀書。中泰未建交前，他儂——巴博元帥當權時，他奉命前往北京試探，從事聞名的‘乒乓外交’，後任民會主席。

巴曼·阿里綠訕是泰國黨創始人之一，在政壇上一度舉足輕重。他四歲時，父親就與世長辭。他的泰人母親去世前留下有關祖籍在“渡頭村”和“馬升典”的片言只語。1989 年，他到中國尋根。原來他在潮陽縣貴嶼鎮渡頭村有個同父異母兄長，叫馬升典。馬升典從泰國帶回其父親馬紅蓮的骨灰，葬在家鄉。他于 1950 年去世。他的老伴和子女都知道他們在泰國有個叔父（即巴曼），名叫馬升平。

米猜·盧趨攀（盧自洵），著名法律專家，多屆上議院議長。其父從廣東到泰國創業。他有一名兄長名盧飛烈在台灣，一名兄長在中國大陸。

披猜·叻達軍（陳裕才）祖籍澄海縣東里鎮。曾任民會主席。1975 年任外交部長時，曾專程回故里。後來還帶了弟弟和子侄多次回鄉祭祖。其父陳木盛于 1895 年在曼谷炮台縣出生。其子披集（陳年平）任曼谷市長，有政績。

本屆政府內閣的華裔成員可考者如下：

- 總理：塔信·秦那瓦（姓丘，客家人，第四代華裔）；
- 副總理：磅蓬·阿里綠訕（巴曼阿里綠訕之子，姓馬，潮陽人）；
- 副總理：披塔·因他臘威他耶南（張漢榮）；
- 副總理：素逸·坤吉滴（姓紀）；
- 事務部長：格社·差納翁（楊金泉）
- 財政部長：頌奇·（其兄名曾漢坤）；
- 衛生部長：素達叻·家裕拉攀（陳慧蘭）；
- 實業部長：素里耶·莊侖侖（莊俊奇）；
- 農業部長：趨輯·韓沙越（韓蔚光）；

前教育部長： 格盛·越他納猜（陳國光，現任樞密院大臣）；

司法部長： 蓬貼·貼甘乍那（姓王）；

衛生部副部長：素蓬·賜汪里（李榮烈）；

交通部副部長：巴差·瑪里嫩（徐紅弟）；

交通部副部長：蓬沙功·劉哈威遷（劉明雄）；

農業部副部長：巴博·班差察叻（姓蔡）。

在社會活動方面，早期僑社名重一時的人物有：鄭智勇、蟻光炎、陳立梅、陳景川、廖公輔、余子亮、陳守明賴渠岱，鄭寄雲等。

鄭智勇 1851 年生于泰國，祖籍今潮州市。他發跡後，多次獻出巨資賑濟國內水災和大規模修築潮州韓江堤，在家鄉興辦學校，在泰國支持孫中山革命。他畢生沒有回過故土。1937 年去世後，他的靈柩運回家鄉安葬。

蟻光炎，前泰國中華總商會主席，積極支持中國抗日戰爭、1939 年 11 月 21 日為特務殺害。

金融實業界重要人士有：鄭子彬、伍佐南、鄭午樓、陳弼臣、謝國民、塔信·秦那瓦等。

陳弼臣，1910 年生于泰國吞武里府，祖籍廣東潮陽縣。1944 年創立盤谷銀行。

謝國民的正大集團由其父謝易初和叔父謝少飛奠定基礎後，1971 年與美國資本合作，在飼料和養雞方面發展事業，到了 1980 年，其集團在國內外擁有 41 家公司。其集團在中國大陸的各項投資，大都取得成功。晚近，又投資養蝦業和零售業，都取得輝煌進展。正大集團是泰華資本發展的新模式和新典型。

塔信·秦那瓦的秦那瓦集團，在 1990 年 8 月 31 日才正式獲批准為上市公司，開始通過股市籌措所需資金開拓事業。隨後，該集團把擁有的“泰空”人造衛星的地面經營衛星通訊業權的公司也推上證券市場。在短短數年間，已成為泰國通訊業的老大。塔信·秦那瓦的視野開闊，有高深的行政管理經驗和專業知識，都是他取得成功的重要條件。

文化界有：蕭佛成、李一新、李其雄、陳暑木、蕭元川，謝猶榮，陳毓泰、陳棠花，黃謹良，翁寒光、甲森·素旺那軍（侯森泉，祖籍廣東梅縣）等。

蕭元川，祖籍廣東饒平，編有《暹漢詞典》，對早期中泰文化交流作了巨大貢獻。謝猶榮、陳棠花的泰國史研究，陳毓泰專心研究鄭王，翁寒光泰譯孫子兵法，都對中泰文化交流作了貢獻。

七 新世紀裏的新氣象

二十世紀末，中國實行改革開放，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走向世界，形成新的移民。

這批新移民是坐飛機來的，他們不再像歷史上的移民那樣，為移民口岸的設置所局限。歷史上，寧波港興盛之日，移民暹羅的主要來是江浙；廈門港開設以後，移民暹羅的主要是福建人；等到汕頭開港時，潮州人才大量湧到暹羅。如今的飛機來自中國各地，因此，我們現在在耀華力路、是隆路、在曼谷各地，在各旅遊景點，處處都可以看到來自中國各省市的新移民，他們學歷高，講普通話，充滿自信。他們是中國改革開放之後，或是留學後留居當地，或是通過與家庭團聚、繼承遺產，或是因商業或技術移民而出境的。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分佈在世界各地的中國新移民約有五十多萬。

在泰國各地，也出現了這種新移民，他們是摩登新唐，不再是人們所熟悉的破產農民。江白潮曾辛酸地說：過去華僑出國，“幾乎與‘出國逃難’無異。……這那能說是國家的光榮，不如說是國家的恥辱好了”。[23] 新世紀裏的華人移民的境遇和前輩是天壤之別。

隨著中國經濟的日益強大，綜合國力的提高，中國人走向世界的越來越多。在新世紀裏，這些新移民將在政治、經濟、科技、文化等各個領域為僑居地作出貢獻，同時，亦是中國與世界聯系的新橋樑，對促進經貿合作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為增進中國和世界人民的友好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

注釋

- [1] 黎道綱《泰國古代史地叢考》，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本文提到的泰境古國名稱及若干論點，未註明出處者，皆自本書。
- [2] 饒宗頤《從華人入暹年代史實的探索——早期中泰關係史二三事》，泰國星暹日報，1995年12月9日〈星暹文藝〉版。文內饒宗頤其他觀點，亦引自本文。
- [3] 陳高華《元代中泰關係史二三事》，光明日報，1978年4月6日〈史學〉
- [4] 炮通・通之《從大城環島河道中打撈到的中國瓷器看中泰貿易》泰文《藝術與文化》月刊，1987年2月號